

· 思想史研究 ·

庄子面对人生两难的思考及历代回应

包兆会

(南京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46)

摘要: 人生两难问题主要在内七篇中提出。在《人间世》篇庄子提出了人活在世上在一些特定事件中所面临的“危身”与“危国”的两难选择,在《山木》篇提出了人以有用还是以无用的方式更好地存活于世上。面对人生的两难,庄子的应对方式是不强化、不偏执于某一人生难题中的一端,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虚以待物”,顺任自然。相比于原始儒家和《庄子》外、杂篇作者,庄子提出的人生两难及其应对方式更接近我们文明社会的生活常态。庄子所面对的人生两难实际上反映了人的自由度和社会生存处境问题。历代的解庄者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

关键词: 庄子; 人生两难; 虚以待物

《庄子》所涉及的人生两难问题主要反映在内七篇。庄子在《人间世》篇提出了人活在世上在一些特定事件中所面临“危身”与“危国”的两难选择;在《逍遥游》、《人间世》等篇提出了人以无用而不是有用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存活于世上,因为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现世可以更好地远离祸害,但这样的选择在外篇《山木》篇的一个故事中遇到了相反的结局:会鸣叫的大雁性命被保留、不会鸣叫的大雁却被宰杀。《山木》篇的这个故事进一步深化了人生面临两难的困境:人究竟以有用还是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上?^①

总体上,由庄子内七篇开辟出来的围绕人生两难议题的讨论在外、杂篇中有被弱化甚至被取消的趋势。在外篇《骈拇》、《马蹄》、《祛箠》、《在宥》等篇中有一种归隐的思想,主张人不介入社会文化和秩序,而是隐居山林,——“故贤者伏处大山嵒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在宥》),当一个人选择退出人际活动甚至不愿与世俗为伍、隐居山林时,人生两难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因为人生两难问题只有在人际活动、社会秩序和体制内发生。

要说明的是,庄子思考的人生两难在先秦儒家中不成为问题。庄子面对的人生两难,无论以有用还是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或是面对“危身”与“危国”两者中作出选择,其主要关切点是在人世间做事首要考虑保全人的生命,远离一切祸害。对先秦儒家来说,“保身”是次要的,高举道德义命才是最重要的,孔子提倡杀身成仁,孟子宣扬舍生取义,都强调道义、正义和个人节操的至高性,在面对两者必须作出抉择时,他们认为应该牺牲和损失自身来成就某种道德价值和信念。^②对于以有用还是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先秦儒家选择的是前者。先秦儒家对天下有一

① 在《外物》篇中也有庄子与惠子探讨无用之有用话题,但围绕庄子的言语有用还是无用展开论述,与本文探讨的有用、无用不在同一范围内,故不纳入正文详述。

②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种担当意识 提倡积极介入现世和文化政治活动 提倡有为人生态度。儒家也有面临人生两难选择的困扰 主要表现为汉代后面临忠孝不能两全的难题 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不再展开。^①

另外 还要说明的是 有学者对庄子人生两难议题思考有扩大化倾向。如台湾林明照先生在分析庄子面临人生两难时还加添了其它几组两难困境 如仁或不仁、义或不义、知或不知 并以以下经文作为出处 “不知乎? 人谓我朱愚。知乎? 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 仁则反愁我身; 不义则伤彼 义则反愁我已。”(《庚桑楚》) “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 不争 名亦不成。”(《至乐》) 作者对这几组人生两难困境进行了分析 “若无智巧 则将蒙受愚昧之辱 然而具备了智巧 在苦心积虑下却徒使自身添加愁苦; 不具仁慈之心 则易生害人之念 然而心怀仁慈 却只是让自己对世间的苦难更加悲伤; 不义之行 易于伤人; 然而义行 却又可能伤己。仁、义、知三价值 为世人所称善 然而一旦怀抱此 无论仁或不仁、义或不义、知或不知 都是两难之局。”(子胥) 若不犯颜直谏 则无法成就忠谏之名; 若犯颜直谏 则又将遭刑戮之残害。”但上述这些所谓的人生两难困境实质构不成庄子内篇所思考的人生两难议题。构成庄子内篇中的人生难题的两端首先在人生中都是必要的 并且这一两难中的选择与保全人的性命、远离祸害有关 上述四组的两难困境中一端如仁、义、知、名声与俗世价值关联 庄子不追求俗世流行的价值 对此也并不很关切 所以 由俗世流行的价值所构成的人生两难 如作者所说的“拥抱此等世俗价值所可能陷入三组两难困境”, “声名与性命二者之难以两全: 在世俗称誉与性命之间常是两难的 因为总难以两全”^② 不在庄子的考虑范围。

一、对“有用”、“无用”人生两难的思考

《庄子》中关于有用、无用之讨论首见于《逍遥游》末了惠子与庄子的对话。惠子得一大葫芦 用它盛水 葫芦不能胜任; 剖开作瓢 但瓢大无法在水缸中容身 更谈不上藉此舀水。惠子由此认定它没有用处 拟把它打碎。庄子则认为惠子对葫芦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有问题 是心灵茅塞不通的结果 实际上这么大的葫芦有其用处 游泳时可以当腰舟使用, “虚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紧接着庄子与惠子又进行了另一场对话 话题还是围绕有用、无用展开。惠子有一棵大树 之所以大是因为“不中绳墨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 没有匠人愿意砍伐它 惠子认为这棵树虽大却无用。但庄子认为这棵大树不愁没有用处 它可以栽种在“无何有之乡” 人可以“彷徨乎无为其侧 逍遥乎寝卧其下。”更重要的是 庄子认为 正因为这棵树无用 所以免遭斧头砍伐 没有东西来索求和侵害它 它反而远离了世俗的祸害和“困苦”, “无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 庄子同时列举了那些自以为精明强干的动物 如猫和黄鼠狼 它们行动敏捷 自以为可以东窜西跳 捕捉小动物 但结果“中于机辟 死于罔罟。”

庄子在《逍遥游》末尾肯定了“大瓠”、“大树”的存在价值 认为俗世之人认为它们无用 是因为他们“固拙于用大”。联系上下文语境 庄子在这里对“大瓠”、“大树”存在价值的肯定 与上文

① 忠孝不能两全作为一个人生选择的难题在儒家那里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就其基本倾向来说 在先秦时期 尤其战国中期以前, “孝”优先于“忠” 这是由“亲亲”的传统所决定的, “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论语·述而》) “仁之实 事亲是也; 义之实 从兄是也; 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 “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 到了战国末期, 《吕氏春秋·劝学》中首先提出“先王之教 莫荣于孝 莫显于忠” 这句话看起来是把“忠”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使原本“孝亲”大于“忠君”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将二者并列使用本身就体现了对于“忠君”观念的提升。儒学发展到汉代 儒家思想进一步提出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三纲中君权排在父权前面 君权与父权相比具有了优先性 《白虎通·三纲六纪》云 “三纲者 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礼纬·含文嘉》: “君为臣之纲 父为子之纲 夫为妇之纲。”

② 林明照 《〈庄子〉论处世的两难困境与因应之道》, 《东华汉学》2007年第6期 第64页。

对大鹏高远志向的肯定,以及对蝸、学鸠不理解大鹏高远生活反而讥笑它的描述,实际上一脉相承。正因为俗世之人拘于小而不能理解“大”,所以对大志向者、大的东西的存在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且直接贬之为无用。庄子通过上述寓言中的小大、有用无用之辩间接为自己的存在价值作了辩护和肯定。从《逍遥游》的写作思路来看,庄子还是很在乎他者(如蝸、学鸠、惠子)对自己所选择的大的生活方式的看法^①。这种大的生活方式体现在鹏之“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飞行方式中,也体现在“大瓠”、“大树”之“大”中。这种“大”的生活方式在别人看来是“无用的”,所以庄子在文中对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间接辩护,以期获得别人的理解和尊重。同时庄子又认为,处在俗世之中的人是难以理解这种生活方式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人生境界:“之二虫又何知”、“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夫子又犹有蓬之心也夫”。

庄子最后希望自己像一棵树一样,“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不夭斤斧”,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认为,人处在人群和社会中,易受伤害。

如果说,在《逍遥游》篇庄子与惠子有关有用、无用的辩论重点关乎怎样评价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也旁及无用的存在方式可以保身和远离祸害,那么,到了《人间世》篇,有关有用、无用之辩则主要围绕人的保身展开。《人间世》篇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人面临“危国”与“危身”之间的选择和应对,容后详述。第二部分着力表达“无用”之为“有用”,用树木不成材却终享天年和支离疏形体不全却避开许多灾祸来进行论证,最后一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是整个第二部分的结语。

在《人间世》的第二部分庄子用四个故事来论述“无用”之为“有用”。在第一个故事“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中,栎树正因为是“散木”、“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享受天年;那些有用之木,如“楂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它们因着显露自己才能和有用而招来世俗摧残。第二个故事也是有关不材“大木”可以终其天年,有用之木如柏、桑、楸树因做木柱、栋梁、棺木“夭于斧斤”、不能享受天年的讨论,只不过故事发生地在河南商丘,议论者是南伯子綦。第三个故事讲述的是人选择祭物时常择其好者,那些残疾的、有病的人和物,如白颡的牛、高鼻的小猪和生痔疮的人,因不可用来献祭,他们反而保全了性命。成玄英此段注曰:“巫师祝史解除之时,知此三者不堪享祭,故弃而不用,以为不善之物也。然神圣之人,知佞造化,知不材无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颡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说,适是小巫之鄙情,岂曰大人之适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为吉祥大善之事也。”^②这些在世人看来不吉祥的,却因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在“神人”眼里看为“大祥”。第四个故事中形体支离不全的支离疏因身体残疾在世人看来“无用”,但因此免去了兵役和劳役,避免了在战场上被杀戮的危险和劳役致死的可能,因着身体残疾他还可领取政府救济,这样“无用”的人却“养其身,终其天年”。

有意味的是,在第一个故事中栎树之所以能保身、远离祸害,不全是无用,它是社树,用来让人瞻仰。所以当木匠把栎树托梦给他的内容即它正因为无用才长得如此大并保全性命告诉弟子后,木匠的弟子却为此感到疑惑,既然栎树定意在于求取无用,“则为社何邪?”木匠的回答是如果它不做社树的话,它有可能会遭到砍伐,“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这说明庄子在肯定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的同时,也不免对这种生存方式是否能绝对带来“保身”和远离祸害是存有疑虑

① 从《逍遥游》行文可窥出其中一二。庄子一开始描写大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那也是庄子的理想和梦想,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像大鹏鸟一样生活,但有意味的是,梦想总归是梦想,对地上生活的牵挂和对他人注视目光的反应很快让大鹏鸟“飞行”的翅膀折断,大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飞行的描述在作者的笔下很快戛然而止,作者的写作转向地上,紧接着描写了蝸和学鸠在地上的生活以及它们对大鹏鸟高远生活的嘲讽。

②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一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页。

的,换句话说,庄子仅有限肯定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比以有用的方式存活于世更易保身和远离祸害。庄文虽没有对支离疏的生存方式提出疑问,但这个故事本身隐含了支离疏的生存方式不一定能让其保身、远离祸害,因为当政者可能因其一无所用撇弃他,不给他粮食,以贫穷奴役他;他人可能因其无社会地位和一无所用,侮辱甚至以暴力侵害他。

庄子对以无用方式存活于世是否会带来保身和远离祸害的疑虑和思考,终于在《山木》篇中演绎出人生两难选择的故事。《山木》篇的开头同样重复着内篇“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的故事。但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庄子及其弟子留宿山中,友人热情招待之,并杀不鸣大雁招待客人。庄子的弟子自然产生疑问,并向庄子请教为什么“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庄子的回答意味深长,他没有说哪一种存在方式更好,只是说如果是他,他存活的方式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不拘泥、不偏滞于某一端——“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因为万物都在变化当中,有用的有一天也会转化为亏损和被抛弃,贤能的也会受到谋算,无用无能的会受到欺负——“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关键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处世,都要做到虚以待物,不受外物束缚,“物物而不物于物”,只有这样活着才不会劳累,“才则胡可得而累邪”!

至此,发轫于《逍遥游》末了的有用、无用之辩经《人间世》篇中对无用之用的强调并同时对此选择有限的肯定,最终使该问题在《山木》篇中推演为一个人人生两难选择。面对这一难题,《山木》篇中的庄子给予了中肯和成熟的回答,这也是《庄子》书中讨论该难题以来对这一难题最好的应对,说明了庄子及其继承者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所显示的成熟和深度。

二、对“危国”、“危身”人生两难的思考

庄子对“危国”、“危身”人生两难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人间世》篇。该篇主要描述人世间关系的纷争纠结,以及人如何协调自处与他处。人生活在社会体制脉络中,这必然带出个人以何种方式生活于世间的课题。若一个人正直、有正义感和责任感,面对社会的不公、他人的无耻和不道德,他要不要站出来揭露社会和他人丑恶的一面,若他所揭露的是权倾一方、穷凶极恶的国君和诸侯,他就有可能面临对方的报复和残害,他就无法保身;若他不揭露,对方继续为虎作伥,则国将不国,对国家和百姓造成进一步危害,这就是《人间世》开篇“颜回见仲尼”的故事中颜回所遇到的人生难题。颜回要去卫国,希望通过自己的诚言德行能改变行事专断、“轻用其国”、“轻用民死”的卫君,以减轻卫国百姓的疾苦,“则庶几其国有瘳乎”,但也面临着被卫君戕害的危险。

紧接着上述故事的是叶公子高遇到的人生难题。叶公子高遇到的人生具体难题与颜回不同,但选择上的两难与上述相似。叶公子高为楚王出使齐国,齐国对外交使节表面客气实者怠慢,叶公子高要完成楚王交代的任务难度很大,但“事若不成”,回去后势必遭楚王的惩罚——“有人道之患”;事若成,自己也因着办事过程中的焦虑和操劳成疾——“有阴阳之患”。

第三个故事同样是一个有关“危国”、“危身”人生两难选择的故事。颜阖将作卫灵公太子的师傅,颜阖所面对的卫太子“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颜阖为这一难题向卫国贤大夫蘧伯玉请教并请对方能给他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面对人生的两难,尤其面对“危国”与“危身”这一人生两难,在《人间世》篇中庄子借孔子和蘧伯玉的口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处世方式低调、谨慎、不张扬——“戒之,慎之”,“与人为徒”和“与古为徒”,最终以不强求、顺其自然即“不得已”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具体表现在颜回处理这一问题时“入则鸣,不入则止”——能接纳你意见的就说,不能接纳你意见的就不说,也表现在叶

公子高在面对楚王交给的任务以及完成使命这两者上既不刻意拒绝,也不强求成功。

庄子解决“危国”、“危身”这一人生难题的方案与他解决另一人生难题即以有用还是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的方案几近相同。庄子在《人间世》、《山木》篇所给出的答案都是不强化和偏执于某一人生难题中的一端——或有用,或无用,或国,或身,或“人事”,或“阴阳”,认为对此应对的方式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虚以待物”,顺任自然。由于应对这两个人生难题的方案几近相同,促使《人间世》篇在讲完上述三个故事后,文本的叙述紧接着转向了对人是有用还是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的探讨。

遗憾的是,外、杂篇总体上没有延伸和拓展对“危国”、“危身”两难的思考。内篇《人间世》篇庄子借着仲尼的口认为“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正视个人生活在国家社会政治秩序脉络中,臣与君、个人与国家构成一种关系甚至是张力关系,成玄英在此疏曰:“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成其节,此乃分义相投,非关天性。然六合虽宽,未有无君之国,若有罪责,亦何处逃愆!是以奉命即行,无劳进退。”但外、杂篇作者因着情感上怀古或生存方式上避世^①,对这一问题没有足够关注,臣与君、个人与国家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在这里被淡化甚至取消。自然,庄子思考的这一人生两难问题在此被消解,庄子对这一人生两难问题展开的幅度也没有前一个人生两难问题开阔。外篇《外物》篇也提到了龙逢与夏桀,比干、恶来、箕子与商纣,苌弘与周灵王等君臣关系,作为臣的他们或被诛或遭杀或佯狂或自杀或浮世,但《外物》篇作者提及他们的重点不是为了延续内篇中有关“危国”与“危身”之间的人生两难选择的思考,而是强调臣子即使忠心也不一定得君王宠信——“忠未必信”进而申论外在事物没有一定准则。

三、历代的回应

庄子提出的人生两难及其应对方式,历代注庄者对此作了不同的回应,尤其对庄子在面对人生两难时所提出的应对方案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略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肯定庄子提出的“与时俱化”、“无肯专为”的人生策略,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人生策略如何操作及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如魏晋郭象曰“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惟与时俱化者,能涉变而常通耳。”宋林希逸曰“叹人事之无常,危机之可畏也。故嘱其弟子识之,唯顺乎自然,则可以自免也。”第二种肯定庄子提出的“乘道德而浮游”、“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人生策略,强调回到万物之祖,“万物之祖,始于无有。无有,岂尚落在材不材上?”(明陶崇道)清宣颖曰“若材若不材,犹以两界而不免于伤,唯道德,则材不材之迹俱化,超然万物之上,累何自至耶?呜呼!斯乡也,农黄以后其不再见矣乎!”^②第三种强调远离祸害之道,在于去其自贤,如明陆西星曰“此篇(指《山木篇》)所论全身免患之道,最为详悉,正好与内篇《人间世》参看,其要只在虚己顺时,而去其自贤之心。熟读此者,可以经世务矣。”第四种强调了人生的无可奈何,如近代朱青长曰“因设两问自难,作《山木》十三”,当代方勇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刑戮者相望’的残酷现实面前,作者已完全感到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因而只好韬光敛迹,超然物外,以便使自己远离祸患,到精神的自由王国里去获得彻底的解脱。”^③第

① 外、杂篇中情感上怀古的比较典型篇目如《骈拇》、《马蹄》、《胠箝》、《在宥》、《天地》、《盗跖》等,这些篇目的作者向往“至德之世”;生活方式上选择避世比较典型的篇目如《让王》、《渔父》等,这些篇目中提到了很多的隐居者,如列子、王子搜、魏牟、渔父等。

② 以上资料摘自《山木》首段“分解”部分,详见方勇《庄子纂要》(四)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950-954页。

③ 以上资料摘自《山木》“解题”部分,详见方勇《庄子纂要》(四)第944-946页。

五种强调处人间世 重退藏 但不必归隐山林 在朝市就可过心隐、身隐、自适自得、至真的生活，如明袁中道曰“不独山林可隐也 朝市亦可隐也；不独朝市可隐也 暴主之前亦可隐也。行而无蹊 真而无伪 则扫踪绝迹 无翼而非 无知而知。前此者 吾不知矣。若东方朔之隐于汉武帝 狄梁公之隐于武后朝 亦庶几矣。……不材之木 不材之人 全其天年。膏火山木 歌于楚狂 亦欲其退藏也。夫人间世之道 莫妙于退藏矣。退藏非不用也 有可用 则莫能用。故退藏不用 正所以用也。……或曰：老庄之处人间世 重退藏矣 得无与乡愿类乎？曰：正相反也。老庄以退藏为主者也 乡愿以表暴为主者也。……老庄自适自得 乡愿适人得人。老庄处众人之所恶 乡愿处众人之所好。……老庄以不用为用 乡愿似有用而无用。老庄至真 乡愿至假。”^①袁中道的应对之道有点类似于陆西星所说的“去其自贤之心”但他强调不刻意“去其自贤”肯定自身可用 只不过世道让其莫能其用，“故退藏不用”。第六种对人生两难的应对方式是佛家方式的 以明末清初方以智为代表 曰“人间险阻场也 诬人间乎！心若不生 何险何阻？然以有心无心之幡 争雄妙祸之门 裨贩利器 甚则诬天 流涕久矣。迷阳迷阳 郤曲郤曲。三陈九卦 惧以终始。忧患之密 何其不得已也若此！……汝之师曰：人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②方以智认为面对人生的险境 若置个人生死得失于度外 选择时就不会患得患失 所以他认为“治国也 出使也 傅太子也 皆折輒触樊之族也”。1650年 清兵攻陷广西平乐 方以智被捕 《清史稿·方以智传》载曰“行至平乐 被縶。其帅欲降之 左置官服 右白刃 惟所择 以智趋右 帅更加礼敬 始听为僧。”方以智当时面临降之居官但节气不保、不降被杀的人生两难选择 但他视死如归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回应了这一困境。第七种应对方式直接采取归隐山林。清代诗人田雯以诗对“木雁两难”问题作了如下回应“才与不才兼木雁 隐能终隐伴渔樵。”（《春日十首》其一）“才与不才兼木雁”表明了诗人自处的生命态度，“隐能终隐伴渔樵”则将归隐渔樵作为这种生命态度的实践路径。

四、总 结

对于庄子所思考的人生两难选择 原始儒家和《庄子》外杂篇或不存在或不像庄子所感受到的那样深切或严重 值得深思。面对自身生命遭到威胁 大多数人并不都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方式解决实际生活中与身、生构成的冲突和两难 所以原始儒家这种解决与身、生有关的人生难题的方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大多数人所选择的；同样 以选择退出人际活动甚至不愿与世俗为伍、隐居山林的避世方式也不是人生的常态 毕竟大多数人生活在社会文化和秩序的脉络中 尤其当人心不再本真、私欲横行 外、杂篇的作者还要以怀古和托古的方式解决现世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丑陋 这样的设想不仅简单幼稚也不切实际。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庄子所提出的人生两难问题及对其的应对更接近我们文明社会的生活常态。庄子所揭示的人生两难实质上揭示了我们人类生存的真实困境 所以历代注庄者面对这一“人类共同经验”时心有戚戚^③ 各自对庄子处理人生难题的方式进行了不同的回应和评价。要圆满处理这些人生难题也确实很难 庄子也承认“此其难者”（《人间世》）但庄子却敢于拿出来讨论并深入思考 这显示了庄子敢于面对人

① 参见方勇《庄子纂要》（八）第756页。

② 方以智《药地炮庄总论下》转引自方勇《庄子纂要》（八）第865页。

③ 现代注庄者也有这方面的回响。钱穆先生在《庄子纂笺·序言》中感慨“报载平、津大学教授 方集中思想改造 竟坦白者踰六千人 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 亦将何以自处？作逍遥之游乎 则何逃于随群虱而处裨？齐物论之芒乎 则何逃于必一马之是期？将养其生乎 则游刃而无地。将处于人间乎 则散木而且翦。倏忽无情 混沌必凿。德符虽充 桎梏难解。计惟鼠肝虫臂 唯命之从。曾是以为人之宗师乎！又乌得求曳尾于涂中？又乌得观鱼乐于濠上？”他感慨的是 在特定的年代中 在人间如庄子在《逍遥游》和《人间世》中所描述的散木一样活着也难。

生真实困境的勇气,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所显示的成熟度以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至今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即应根据实际情况以顺其自然、不执著于一端、忘其得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生存的困境,这彰显了庄子超越具体时空的人生智慧和睿智。

庄子所面对的人生两难实际上反映了人的自由度和社会生存的处境。人需要生命的内在自由,但人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中,每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都会要求人人去遵守它们所设定的某些目标和功能,对那些达到社会和文化要求的人给予肯定,称他们为有用,对那些达不到社会和文化要求的人,称他们为无用;并且对那些不遵守主流文化的人进行“规训”,对那些达不到社会所设定目标和功能的人进行鞭策并采用惩罚机制,这样以便让他们从“无用”状态转变为“有用”状态。庄子体验和觉察到了这样的人类处境。他写大鹏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飞行方式,写大鹏鸟的自由飞翔,但写作笔触很快从天上转到地上,描写蝮、学鸠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不理解和嘲笑,“彼且奚适也?”蝮、学鸠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生存方式背后体现的是社会文化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大鹏鸟的生存方式则溢出了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自然,大鹏鸟在选择与众不同的生活中感受到了社会环境给予的强大压力。庄子在不同场合、不同篇目中反复探讨树的有用与无用^①,正是对这种生存处境的认识。

庄子在《人间世》篇和《逍遥游》篇末了讨论人以有用还是以无用的方式存活于世,实际上是以当时先秦儒家等主流文化为背景提出的。当时先秦儒家等主流文化对有用的人生还是无用的人生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庄子在内篇中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主流文化价值观针锋相对,他认为主流文化价值观上所认为的无用在他看起来却是有用的,他肯定了生命本身的存在,毕竟生命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远超于人竭力所追求的目标和功能,这些目标和功能由社会设定。

庄子所体会到的人生的两难更多时候来自于社会生存处境,若社会生存处境发生改变,比如当社会对人的存在样态持多元、宽容,不再以有用、无用要求和强制人遵守某一端,当社会制度得以改善,君与臣、个体与国家不再陷入紧张关系和非此即彼时,则庄子所面对的人生两难困境会有所削弱或减轻。这些方面庄子没有继续进一步思考^②。概言之,庄子涉及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却很少涉及影响人精神自由的外在环境政治自由。在英国当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看来,真正的自由不是通过自我克制、向内收缩、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获得宁静和自由,而应在经验领域凭借其实践力量,通过排除现实的障碍和压制而获得的自由——尤其指政治自由。^③在这一点上,庄子在解决政治自由方面确是不足,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面对强权者的奴役,庄子所做的是与之保持距离,而不是积极开展政治改革和抗争,更多的是退回到内心世界。庄子时代生存环境的不自由正是庄子人生两难无法化解的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 赵枫)

① 在《逍遥游》结尾,庄子与惠子讨论树的有用与无用;在《人间世》篇“匠石之齐”和“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两个故事中分别提到无用之大树实乃有用,因为“无所可用”,故“终其天年”;在《山木》篇,庄子与弟子对话中提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② 庄子在内篇中提到君王用强制性的方法推广“经式义度”,百姓因惧其高压专制不得不听从,“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应帝王》)但庄子没有进一步探讨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以便让百姓在选择某一端时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③ “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我的意志遇到阻碍的世界中。那些执着于人‘消极’自由概念的人也许能得到原谅,如果他们觉得自我克制并不是惟一的克服障碍之法;同样可能的方法是通过排除障碍来克服障碍:自然物体用自然的办法,人的阻力则用强力或说服的办法,就像我诱使某人让我让座,或者征服威胁我国利益的国家一样。这些行动也许并不公正,它们也许含有暴力、残酷、对别人的奴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动者却能最名副其实地增加他自己的自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10-211页)